

# 日常生活與普通人家：賴香吟白色 恐怖作品的日常叛離與隱匿文本\*

李淑君\*\*、徐國明\*\*\*

## 摘 要

本文關切賴香吟〈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凱西小姐〉（均收錄於2022年出版的《白色畫像》）中的普通人們與日常生活，從中討論白色恐怖的日常叛離、隱匿文本、歷史結構與人為主體的相互關係，並試圖以塞托（**Michel De Certeau**）提出的戰略（**strategy**）與戰術（**tactic**）、斯科特（**James C. Scott**）強調的弱者實踐與隱匿文本，以及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揭示的叛離（**exit**）、抗議（**voice**）、忠誠（**loyalty**）這三種與威權的距離來進一步思考白色恐怖的日常實踐、日常反抗、隱蔽文本、叛離逃逸及普通行為者的心靈與行動。藉此，本文首先提出賴香吟在三篇作品中，深刻描繪臺灣人如何陷入政治忠誠度的嫌疑犯、語言的鄉土味與日本氣，甚而被排除公職領域的一體三面。其次，跳脫反抗史觀與苦難敘事的雙重論述，轉移到安身立命的視角論及日常實踐中順服／反抗的擺盪、受害／加害邊界的曖昧。尤其，〈清治先生〉前臺表面忠誠、後臺卻隱匿文本的抵抗，而〈文惠女士〉作為臺籍女性幫傭的繁瑣日常成為國族隱喻，並以瑣碎拒絕政策網羅與主體分裂，最後〈凱西

2024.09.23收稿，2024.11.27通過刊登，2024.12.02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綜橫交互下的比較視野：中／臺女作家威權書寫的世代性與跨地域」（MOST 110-2410-H-037-010-）之部分成果。感謝匿名審查委員與編委會寶貴且具體的建議，協助深化理論思辯與論述觀點，修改過程獲益良多。感謝共同作者徐國明博士共同完成論文第一節之文獻回顧、賴香吟作品之梳理，且協助全文之潤稿、格式校對。感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生林苗玄擔任國科會計畫助理期間協助行政庶務，Amanda Barrow協助英文之編譯。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小姐〉的叛離則是一種被迫的流亡，然而，此種流亡也展現海外臺灣人拒絕被治理的態度。是以，這三篇作品互文白色恐怖時期的日常生活與普通人家，進而體現日常叛離、隱匿文本、不受統治的戰術。

關鍵詞：賴香吟、白色畫像、日常實踐、弱者的武器、隱匿文本

# Daily Life and Ordinary People: Everyday Resistance and Hidden Transcripts in Kaori Lai's White Terror Fiction

Li, Shu-Chun<sup>\*</sup>、Hsu, Kuo-Ming<sup>\*\*</sup>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ordinary people practiced everyday resistance during Taiwan's White Terror period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ree stories from Kaori Lai's *Portraits in White*: "Mr. Ching-chih," "Ms. Wen-hui," and "Miss. Kathy." It explores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practices of disengagement (exit), hidden narratives,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within broader historical structures. Drawing on Michel de Certeau's concepts of strategy and tactic, James C. Scott's analysis of weapons of the weak and hidden transcripts, and Albert O. Hirschman's framework of exit, voice, and loyalty as tools for distancing from author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ordinary actors engaged in daily resistance through both thought and actions. Through these three stories, Lai reveals how the White Terror regime scrutinized Taiwanese individuals—questioning their political loyalties, impacting their use of local Taiwanese and Japanes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nd ultimately excluding many from public office. Lai challenges traditional White Terror historiography, which often focuses solely on resistance or suffering, by depicting how ordinary people's search for daily stability gave rise to practices that oscillated between submission and resistance,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victim and perpetrator. While "Mr. Ching-chih" presents an outward facade of regime loyalty, Lai embeds subtle forms of resistance within its subtext. In "Ms. Wen-hui," Lai portrays the protagonist—a female domestic helper—as a metaphor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depicting how she

---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reserves her identity through small daily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regime policies. Finally, the narrative of "Miss. Kathy" reveals how forced exile became a form of "exit" that, paradoxically, expressed overseas Taiwanese people's resistance to regime control. Through these three stories, Lai illuminates how ordinary people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embodied various forms of resistance—whether through tactics of exit, hidden transcripts, or daily refusal to be governed.

Keywords: Kaori Lai, *Portraits in White*, Daily Practice, weapons of the weak, hidden transcripts

## 一、前言

本文關切賴香吟最新作品〈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凱西小姐〉（均收錄於2022年出版的《白色畫像》）中的普通人們與日常生活，從中討論白色恐怖時期的日常叛離、隱匿文本、歷史結構與人為主體的相互關係。事實上，作為臺灣青壯世代的代表作家，賴香吟自九〇年代出道以來即嶄露頭角，備受相關領域的學者關注。過往研究指出，賴香吟早期的文學創作處理了女性、鄉土與國族之間的錯綜關係，顯現女性鄉土想像如何開啟國族寓言，<sup>1</sup> 並且也因為親身經歷過解嚴後野百合學運的歷史場景，在作品中也不難察覺賴香吟對於戒嚴時期國家體制的反思，多少映照出學運世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和自我批判。<sup>2</sup> 但是，不同於以時代錨定的作家位置，從回歸寫作的主體、技術和基調來看，賴香吟選擇偏離具有展演性質的社會議題，退居個人、凝視內在，「從自我出發，又危顛顛的回到自我」的探詢進路，不由相應著所謂內向世代的文學系譜。<sup>3</sup> 基本上，截至目前有關賴香吟作品的討論，大都圍繞在女性、國族、後殖民、創傷、學運世代、內向世代等關鍵詞，甚而《白色畫像》集結出版前後的研究趨向，還是在這些既有的基礎上繼續深掘，鮮有從創作思考如何回應歷史、政治及社會的研究面向進一步開展，略為可惜。

賴香吟早期作品《散步到他方》（1997）、《霧中風景》（1998）具有存在主義文學的特色，展現了黃錦樹所言的早熟寫作能力，以及探究存有未致的可能性。<sup>4</sup> 劉淑貞也指出其九〇年代作品的抒情性質與逃逸傾向。<sup>5</sup> 兩千年後，賴香吟涉及白色恐怖書寫的作品《島》（2000）、《翻譯者》（2017）、《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臺灣小說風景》（2019）、《島》

<sup>1</sup> 劉亮雅，〈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期（2009），頁33。

<sup>2</sup>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中外文學》39卷4期（2010），頁39-40。

<sup>3</sup> 黃錦樹，〈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論嘗試文》（臺北：麥田，2016），頁325。

<sup>4</sup> 黃錦樹，〈散步到他方〉，《霧中風景》（臺北：印刻，2007），頁195-202。

<sup>5</sup> 劉淑貞，〈風景的罪愆——論賴香吟小說中的抒情主體及其演化〉，《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3期（2021），頁139-179。

(2022新版)、《白色畫像》(2022)等作品，皆貼近臺灣的政治脈動進行書寫，而劉亮雅、范銘如分別透過《島》、《霧中風景》和《翻譯者》的作品分析，提出其中的歷史視角：(一)、女性鄉土想像的「鄉土」不只是家鄉，更是臺灣的歷史記憶，<sup>6</sup> 剖析地方書寫與國族史話之間的關連性。<sup>7</sup> (二)、在跨族群翻譯和歷史書寫中，以女性視角批判反對運動的國族主義父權中心。<sup>8</sup> 上述研究的貢獻指出，賴香吟作品具反殖民、反身性、地方與國族的性別視角。除此之外，近幾年陸續發表的相關研究，則是關切賴香吟何以透過女性視角與寫作技術開創獨特的敘事美學。例如，鄭淑怡就借助《其後それから》(2012)一書，細緻地觀察到原本習於置身其外和減法書寫的賴香吟開始轉向，不只運用大量的自我涉入、返回現場，重建生命場景的意義，更體現作者由被動客體逐步轉變為敘事主體的建構過程。<sup>9</sup> 相對地，廖紹凱聚焦在《翻譯者》看似對於解嚴後臺灣社會的觀察，在通過後設小說的結構布局，呈現出來的卻是身為寫作者的女性敘述者的失語困境，藉此觸及文字如何再現他者，文學創作又能如何介入或回應社會情境的倫理命題，形成具有高度自反性(self-reflexivity)的寫作策略。<sup>10</sup>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劉淑貞在回溯、梳理賴香吟的創作歷程時，發現其作品概念的發展一直困陷於書寫與再現的辯證思考，但在《天亮之前的戀愛》和〈清治先生〉卻開始產生劇烈的轉變，從長年以來的抒情獨白，逐漸走入歷史現場，甚至對於歷史進行還原式的再現，這不只改寫過往作品中的「抒情」意義，更重新啟動再現能力的企圖。<sup>11</sup>

由此，本文關注的《白色畫像》收錄篇章所描寫的白色恐怖日常，其

<sup>6</sup> 劉亮雅，〈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例〉，頁7-36。

<sup>7</sup> 范銘如，〈當代小說的南部書寫〉，邱貴芬、柳書琴主編，《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 3期：臺灣號》(臺北：文建會，2007)，頁379-398。

<sup>8</sup> 劉亮雅，〈跨族群翻譯與歷史書寫：以李昂〈彩妝血祭〉與賴香吟〈翻譯者〉為例〉，《中外文學》34卷11期(2006)，頁133-155。

<sup>9</sup> 鄭淑怡，〈從零餘者、倖存者，回歸於生手的天真：論賴香吟《其後それから》的加法書寫〉，《子衿論衡》6期(2021)，頁76。

<sup>10</sup> 廖紹凱，〈置疑的寫作者：論賴香吟《翻譯者》的「自反寫作」與失語困境〉，《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9期(2023)，頁82。

<sup>11</sup> 劉淑貞，〈風景的罪愆——論賴香吟小說中的抒情主體及其演化〉，頁173-177。

實是賴香吟在歷經《其後それから》與現實和解、面對書寫的意義，以及接續展開的《天亮之前的戀愛》重寫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系列篇章後，再再推助其起身追尋戒嚴時期臺灣社會的日常記憶。尤其，正如梁世韜所揭示的，自二〇〇〇年代之後民間基層開始組織推動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隨著政黨輪替，國家政府繼而進行檔案解密、清除威權和平復司法工作，而同一時間，有關威權統治時期的白色恐怖口述歷史和文學選集也相繼出版，如何在當前轉型正義的社會脈絡下，持續探問、思索文學書寫究竟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功用與意義，顯然也是另一個重要課題。<sup>12</sup> 承此，以白色恐怖為時代背景的《白色畫像》，似乎可以適切地回應這道課題，雖然歷史書寫一直是臺灣作家的核心關懷，但賴香吟長期投入國族主義、政治威權和社會運動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探索，絕非一蹴可幾，而是潛流於其創作思考已久。

事實上，賴香吟曾經在與莊瑞琳的對談過程中，簡要交代作品概念的線性史觀發展，「《翻譯者》寫解嚴後三十年……如果『白色畫像』可以做完，剛好就從白色恐怖接到解嚴，《天亮之前的戀愛》則是從日治接到白恐……這樣接起來，整條線就聯繫了」<sup>13</sup>。這段漫漫的創作歷程，賴香吟持續思考如何在寫作中將時代感放進去，以及如何文學地把政治放進來，這樣看似小說方法的課題，其實映現出來的卻是過去置身學運現場的生命經驗，無論是運動本身的內在層面，或是不如想像中那般單純、熱情，窺見當中一些人事物的負面現象，致使日後直面社會運動或政治解嚴的相關取材時，賴香吟總是選擇背離留戀、歌頌的主流姿態，重新通過反省的視角來回望歷史。<sup>14</sup> 舉例來說，最為顯著的，應該就是賴香吟對於九〇年代的觀察，對談中莊瑞琳直指出這個時代背景在其歷年作品裡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像是從《島》、《史前生活》、《其後それから》到《翻譯者》幾乎都有以九〇年代為設定場景的篇章，甚至前兩部作品還分別收錄〈告別九〇年代〉的後記

<sup>12</sup> 梁世韜，〈流行歌曲與記憶的重唱疊影——論賴香吟〈文青之死〉及《白色畫像》的文本互涉與歷史重構〉，《雲漢學刊》47期（2024），頁207-212。

<sup>13</sup>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2期（2020），頁170-171。

<sup>14</sup> 黃懿慧，《學運世代知識分子的知識實踐：賴香吟小說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115-116。

和〈回看九〇年代〉的序言。<sup>15</sup> 或者，可以深入一點地說，九〇年代不只是臺灣社會解嚴後的第一個十年，期間還先後經歷了野百合學運、第一次總統直選和第一次政黨輪替，而賴香吟也數次提及自己認為九〇年代的關鍵字是「解嚴的未完成」，原因在於當時的社會狀態還在學習如何民主、如何自由。

除此之外，就寫作策略和文學風格來說，賴香吟經常在政治事件或公共議題的呈現上，採取非直接關係人的角度來拉開距離，捨棄參與者、受害者及其家屬親友的證言，刻意營造出隔閡感，而承擔故事敘述的往往卻是一般意義之外、甚或歷史邊緣的路人角色，這樣看似見證歷史現場但又含糊其辭的時空布局，形成一種「大多數的臺灣人，就像文本中的路人們，置身其中亦像局外之人，有介入有波及，皆難以從眾多分割畫面拼湊出歷史全景」的小說張力。<sup>16</sup> 雖然，賴香吟對此坦言自己較少在文學上處理具體核心的歷史人物，是因為文獻史料的完成度更高外，也特別謹慎於作家擁有的書寫權力，不隨意塗抹他人。<sup>17</sup> 另一方面，如同賴香吟一再於不同訪談提到的，自己並不是反對文學政治化，而是在面對政治議題的創作思考上，總是抱持「文學寫到政治，那不過是因為我們的生活迴避不了政治，我不想裝作沒事，但寫法依然是從生活過去，而不是從政治過來」<sup>18</sup>，或許這就是賴香吟的文學創作能夠開展戒嚴時期臺灣社會的日常性、感官性及潛意識的箇中因素，進而彰顯這個威權體制得以建立的微妙和複雜。

## 二、普通日常與隱匿文本：臺灣人日常成為政治

具體來說，賴香吟書寫政治局勢如何捲動、滲透、擴散於日常生活，並非始於《白色畫像》，在《其後それから》以邱妙津之死與父親離世為主

<sup>15</sup>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頁148-149。

<sup>16</sup> 范銘如，〈路人的政治，隔的文學〉，《印刻文學生活誌》167期（2017），頁76-79。

<sup>17</sup>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頁154。

<sup>18</sup> 蔡雨辰，〈文學如何與當代生活共生——專訪作家賴香吟〉，《迷誠品》，<https://meet.eslite.com-tw/tc/article/201803070031>（2024.06.19徵引）。

題的「其後與倖存之書」<sup>19</sup>，死者生前所鑲嵌的政治、所滲透的青春時光即為「領袖就是領袖，百姓就是百姓；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sup>20</sup>的日常氛圍，是充滿國家秩序和性別秩序的時代。到了《天亮之前的戀愛》則是書寫日治到戰後的歷史夾縫中人們的日常及平凡，當楊逵、龍瑛宗、鍾理和這一代人面臨政權嬗遞，或如楊逵被捕導致家庭困頓、子女失學，或如龍瑛宗「有很多話想說，但找不到適切的字詞」<sup>21</sup>，或如鍾理和感嘆二二八被槍決的少年，以及臺灣白薯的命運。<sup>22</sup> 尤其，賴香吟在書寫呂赫若的〈清秋〉時，「我覺得家裡的長輩都很了不起，他們能夠每天持續地忍受平凡的生活」<sup>23</sup>，此時政治威權下的「平凡」，意味著忍受被遺忘、被抹除的生活。在這裡，思索「平凡」的臺灣意義，即可呈現出平凡度日的政治威權視角。

更進一步地看，〈虛構一九八七〉、〈野地一九八九〉、〈情書一九九一〉、〈喧嘩一九九四〉、〈婚禮一九九六〉<sup>24</sup> 也都涉及解除戒嚴、鄭南榕自焚、農民運動，是扣緊臺灣政治脈動的作品，同樣可以看出當中對於人的日常與時代關係的思考。例如，〈情書一九九一〉敘述來自雲林農村的主角雖沒有強烈的政治訴求，但因對鄉土、農村的感情而關注農民運動，藉由雲林農村的日常視角加以批判知識疏離、大學菁英與教育當權者。<sup>25</sup> 除此之外，無論是〈婚禮一九九六〉描述臺灣政治如何將日常生活捲入，<sup>26</sup> 或是〈虛構一九八七〉書寫女學生之死與二二八敘述之間的關係，<sup>27</sup> 甚至於〈野地一九八九〉在敘述鄭南榕的喪禮和天安門事件時，進一步反思置身在教育體制中的高中生涯，面臨政治被化約、蒙騙為軍訓、演講、模範生等相關議題，「政治之於生活，要故作率性頂多也只是不去升降旗，唱國歌不立

<sup>19</sup> 賴香吟，《其後それから》（新北：印刻，2012），頁249。

<sup>20</sup> 賴香吟，《其後それから》，頁13。

<sup>21</sup> 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臺灣小說風景》（新北：印刻，2019），頁144。

<sup>22</sup> 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臺灣小說風景》，頁201-204。

<sup>23</sup> 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臺灣小說風景》，頁190。

<sup>24</sup> 此五篇作品原先收錄於《翻譯者》，後收錄於《島》（2022年重新出版）。

<sup>25</sup> 賴香吟，《翻譯者》（新北：印刻，2017），頁61-76。

<sup>26</sup> 賴香吟，《翻譯者》，頁104-126。

<sup>27</sup> 賴香吟，〈虛構與紀實〉，《島》（臺北：聯合文學，2000），頁52-76。

正，吊兒郎當躲教官罷了」<sup>28</sup>，當敘述者基於無聊而捲入無殼蝸牛運動時，同樣是「和同事瞎混，跟會，講男朋友，講老公，和同事去睡忠孝東路，滿街蝸牛，圖個盡興好玩而已，我懶得去想這是不是政治」<sup>29</sup>。由此可見，這五篇作品都扣緊臺灣政治脈動，書寫日常、平凡與政治的關係，甚至也可能因為日常而成為運動者。

雖然，上述作品不難看出賴香吟對於日常生活與政治社會之間的關注，但《白色畫像》中的〈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及〈凱西小姐〉更明確聚焦在白色恐怖議題，緊扣著普通人的平凡日常。本文在分析上，同樣也互文參照《文青之死》（〈暮色將至〉、〈文青之死〉、〈天竺鼠〉）、《史前生活》（〈蟬聲〉）、《島》（〈喧嘩與酩酊〉）和《蔣經國與李登輝》等作品，藉此整體關照賴香吟作品的思考發展，深化探究《白色畫像》中普通人們看似無作為但日常實踐的平凡中，參與且捲入時代浪潮的特殊性。尤其，《白色畫像》聚焦在戰後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書寫威權下的日常與平凡，建構出兩條層次軸線：其一，白色恐怖的反英雄敘述；其二，日常的反抗、隱匿文本、叛逃離開的多種形式。

首先，《白色畫像》描述白色恐怖的大歷史浪潮，卻是取自默默無名者的小敘事視角，以敘述日常作為「反英雄」敘述，正如左翼史觀關注無名小卒的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自五〇年代開始談論鞋匠、農民、工人等默默無名、被人遺忘、不被記憶的群眾何以是歷史行動者。<sup>30</sup> 在大敘述中，被書寫的抗爭者或受難者經常是被記憶的歷史主體，然而《白色畫像》的體制中人、旁觀者、受害者都是不具有明確身分的匿名者。雖是歷史浪潮的大敘述，但受害、加害、旁觀三方交織都非事件的直接受難者、抗爭者、協力者，甚至是有些與政治事件疏遠的「無足輕重之人」，是無法辨識、非歷史命名的日常群眾。

過去，日常生活總是被貶抑為瑣碎、重複、卑微，然而在左翼、後殖民、解殖、庶民史的思潮發展下，不少論者開始將研究重心轉向日常生活，像是許甄倚就認為日常生活的卑微人物、尋常事物或是日常的重複性是具有

<sup>28</sup> 賴香吟，《翻譯者》，頁49。

<sup>29</sup> 賴香吟，《翻譯者》，頁57。

<sup>30</sup>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蔡宜剛譯，《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上下）（臺北：麥田，2002）。

安身立命、安定人心的價值，甚至可以對抗浩劫的戰爭、創傷、災難的分離、分裂與解體。<sup>31</sup> 同樣地，法國哲學與史學家塞托（De Certeau）於1980年《日常生活實踐》提出兩個層次的論述：首先，從菁英大敘述轉向庶民小敘述，關注無名群眾的反英雄敘述（anti hero），讓普通人浮上檯面成為敘述者。其次，從日常生活實踐探討微觀權力，認為微觀的抵抗建立了微觀的自由，在細微的日常空間中產生戰術。整體上，該論述提到普通人的共同命運、以至關注無名群眾（nobody）可以是反英雄敘述，而日常實踐可以是無聲的顛覆。<sup>32</sup> 日常生活、普通敘述與匿名者的故事，促使我們得以察覺白色恐怖如何捲動整個社會。鄭清文曾提及賴香吟擅於「從沒知沒覺的角度」探索戒嚴後的心靈。<sup>33</sup> 此處，「沒知沒覺」便是即使不被記憶的小寫主體、毫無擁護當權或反抗威權的政治意識，皆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政治氛圍。誠如賴香吟所言，「白色恐怖不一定是明著來的，是不知不覺的生活裡的浸透，洗腦你、管教你」<sup>34</sup>，而劉亮雅也關注到賴香吟的作品在書寫英雄敘事之外的焦灼和挫敗，認為賴香吟「看到了英雄敘事之外那些追求主體性卻未必成功的知識菁英、或是那些連敘事、發聲權也沒有的史畢娃克（Gayatri Spivak）所說的『底層人民』（the subaltern）」<sup>35</sup>，尤其當抗爭艱困時刻，英雄敘事成為追求主體性的凝聚與共生，然而，從庶民敘事可以看見私人情感與社會結構的關係。<sup>36</sup> 本文認為《白色畫像》也延續了「從沒知沒覺的角度」對於白色恐怖的日常與民眾有更深入的書寫。

其次，關於白色恐怖時期的行動難以簡化為抗爭／服從、受害／加害、苦難／英雄的二元敘述，正如同朱宥勳指出的「賴香吟筆下的『背景人物』——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加害者，但同樣艱辛渡過這段歷史的『普

<sup>31</sup> 許甄倚，〈平凡中的非凡：吳爾芙的日常生活書寫與瑣碎政治〉，《英美文學評論》20期（2012），頁97-129。

<sup>32</sup>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1-60.

<sup>33</sup> 鄭清文，〈評審意見：虛構與真實〉，《虛構一九八七：第二屆臺灣文學獎作品集》（高雄：春暉，1999），頁75-76。

<sup>34</sup>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頁166。

<sup>35</sup>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與底層人民〉，頁11。

<sup>36</sup>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與底層人民〉，頁7-43。

通人』」。<sup>37</sup> 背景人物成為主敘述，更繁複地呈現行為背後的日常反抗、隱匿文本、叛離逃逸的多種形式。尤其，過往對於威權下的行動，被強調、被鼓吹的往往是反抗，或如劉亮雅提及的反抗的英雄敘述，而卡繆（Albert Camus）認為面對荒謬的三種可能是反抗、自由、熱情，但最重要的是反抗。反抗意味發聲、判斷與要求，引發意識覺醒、反抗奴役關係。<sup>38</sup> 卡繆這樣的反抗論述是直視威權，反抗才能決定存在。

然而，塞托則複雜化反抗，關注日常生活中非直接抵抗的行為。塞托提出日常生活的實踐，重視日常生活的價值，他指出穿越威權的日常實踐是有可能的，並提出戰略（strategy）與戰術（tactic）的差異。具體來說，戰略會建立起自身場所，佈署各種力量，而戰術則是日常自我場所中展開的實踐，是透過日常微小實踐來進行抵抗的弱者藝術。<sup>39</sup> 另一位理論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弱者的實踐、隱藏的文本、不受統治的藝術等重要概念。戰術如同斯科特提出的「弱者武器」的偽裝、偷渡、零星抵抗、游擊戰式、陽奉陰違的抵抗，呼應塞托指出日常實踐（如言說、閱讀、行走、購物、烹飪等）都是屬於戰術行動。斯科特認為，沉默者、匿名者具有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相對弱勢群體的日常戰術有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誹謗、縱火、暗中破壞、行動拖沓、假裝糊塗，展現出避免直接與威權對抗的特性，此種持續不斷的瑣碎衝突通過不合作讓威權無法執行，即是「反抗的日常形式」。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間，可區分出「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匿文本」（hidden transcript）。高夫曼（Erving Goffman）提及日常生活有前臺與後臺之分，身在前臺時必須處心積慮為了在社會關係中符合期待進行自我展演；後臺則是卸下社會期待的「個人門面」的非正式行為舉止。<sup>40</sup> 上述概念互文對話，「公開的文本」即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舞臺上的表演，那麼「隱藏的文本」就是發生在幕後

<sup>37</sup> 朱宥勳，〈賴香吟《凱西小姐》人物影射筆記〉，《朱宥勳 | 小說·評論·臺灣文學》，<https://chuckchu.com.tw/article/331>（2023.04.02徵引）。

<sup>38</sup>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著，嚴慧瑩譯，《反抗者》（臺北：大塊，2014），頁5-42。

<sup>39</sup>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p.1-60.

<sup>40</sup> 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徐江敏、李姚軍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臺北：桂冠，1992），頁1-83。

的論述與行動，而且此部分是權力所有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sup>41</sup> 無權力者平時被視而不見，在「前臺」充滿權力的情境中表現出遵從，但在「後臺」進行秩序的擾動與逆轉，也就是虛假遵從。雖然不需要將「弱者的武器」浪漫化，但弱者的實踐對於剝削是有邊緣性的影響，縱使並非進行大規模的公開挑戰，而是選擇平靜地逃避，但仍然有可能讓殖民者與威權的政策被削弱。日常反抗是非正式的、隱蔽的，因為公開反抗就可能遭到殘酷的鎮壓。此外，面對國家強大的統治力，逃離和遷徙也是對抗壓迫最常見的一種選擇，<sup>42</sup> 包含違法、不服從、沉默低調、隱姓埋名、暗地勾結，這正是下層階級採取的模式。<sup>43</sup>

倘若抗爭／服從、受害／加害、苦難／英雄非簡化的二元對立，行動的意義也就是多重的，也必須思考行動的意念。其中，行動的意義包含公開反抗、日常戰術、弱者武器、逃離與遷徙。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1970年的作品《叛離、抗議與忠誠》以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無名消費者與組織企業之間的關係，其日常實踐可以叛離（exit）、抗議（voice）、忠誠（loyalty）三種不同態度討論行為者與組織、群眾與團體、人民與威權的距離。本文認為其論述放在人民與國家關係的政治思考也適切。抗議是單刀直入的政治行動，叛離是對厭惡狀態的逃離，而忠誠則是心悅誠服地信服當權。這三者有協商角力，如抗議是叛離的另類選擇，當叛離的空間越來越小，抗議的可能性自然就會提高，反之亦然。相對地，忠誠可能會打消叛離而激起抗議的念頭，若無抗議空間，忠誠者亦有可能叛離。<sup>44</sup> 因此，本文從上述理論視角思考白色恐怖的日常書寫、日常反抗、隱匿文本、叛離逃逸的多種形式，探究《白色畫像》中白色恐怖時代普通行為者的心靈與行動。

誠如前述，賴香吟的《島》、《翻譯者》、《天亮之前的戀愛》都有不

<sup>41</sup> 王毓莉，〈夾縫中求生存：中國大陸社群媒體治理下的抗拒策略〉，《傳播研究與實踐》10卷2期（2020），頁85-114。

<sup>42</sup>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南京：譯林，2007），頁1-3。

<sup>43</sup>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王審言譯，《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臺北：麥田，2021），頁63。

<sup>44</sup>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李宗義、許雅淑譯，《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臺北：商周，2018），頁39-186。

少篇幅是以經歷多重殖民的臺灣人為敘述主體，而〈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凱西小姐〉同樣延續此一關懷，皆以經歷過日治殖民的臺灣人經驗來書寫日常與時代的碰撞，呈現一體三面的日常經驗。在此，所謂的一體三面則是呈現政權遞嬗、多重殖民下，陷入政治忠誠度的嫌疑犯、語言的鄉土味與日本氣、被排除在公職領域的處境。首先，〈清治先生〉的主角清治是在二戰最後的戰火中出生，小學進入新政府的學校，在歌詠「臺灣光復不能忘」的歌曲中成長。但具有日本殖民經驗的清治與張光明，都感受到戰後語言政治的問題，臺灣人所講的臺灣話被視為日本話，此種語言日常影射臺灣人被質疑的忠誠度，呈現經歷日治殖民的臺灣人在戰後面臨的政治忠誠度、被視為漢奸的可疑份子處境。

其次，〈文惠女士〉一文中的文惠，過去基於家裡的需求而前去日本人家當傭工，多少習得日本人的學習教養。婚後，丈夫投資起起落落又中年離世，文惠為求謀生尋找傭工工作，然而戰後改朝換代，文惠帶著一口「破國語」應徵傭工面臨幾次難堪與尷尬，像是受雇於外省家庭的老太太講家鄉話，因無法溝通而遭到辭退。除了溝通難題，應徵傭工時文惠的語言被視為「日本氣」與「鄉土味」，口音成為污名烙印的身分印記。<sup>45</sup> 文惠被否定的「日本氣」與「鄉土味」，正是臺灣人經歷殖民、本土的臺灣經驗，這樣的語言轉換呈現出跨語言一代的處境，以及本省籍的語言及所影射的鄉土、殖民史如何被貶抑。最後，〈凱西小姐〉成長於「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時代，在「一個沒有意底牢結的時代，什麼都是漂浮不牢的」<sup>46</sup> 白茫茫的時代裡，有能力的都先出國了，一去不回居多。本省籍的凱西出國前考取公職餬口謀生，然而第一次未錄取公職考試，第二次才成功擔任公職，原因在於本省籍經驗是面臨省籍在公職領域資源不公的處境。

〈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凱西小姐〉是一體三面，書寫出臺灣人被質疑的忠誠、污名的語言，以及差異的生存條件。眾所周知，楊（Iris Marion Young）曾經在受壓迫的五張臉孔，細緻地區分壓迫包含剝削（exploitation）、邊緣化（marginality）、無能（powerlessness）、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與暴力（violence）。剝削是某社群的勞動成

<sup>45</sup> 賴香吟，〈文惠女士〉，《白色畫像》（新北：印刻，2022），頁120-130。

<sup>46</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白色畫像》，頁170。

果被轉移到受益的社會群體上；邊緣化是被剝奪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無能是無法參與決策過程；文化帝國主義是被價值貶抑；暴力則是對個人或財產的攻擊。<sup>47</sup> 由此，經歷過日治殖民的臺灣人的語言代表鄉土味／日本氣，更意謂政治上忠誠度的可疑性時，不免面臨文化帝國主義的族群被次等化，甚而失去參與公職機會，無法參與公共決策過程的無能化等多重狀態。近幾年，白色恐怖的檔案資料有不少更新出土，也呈現出白色恐怖受難族群在外省與本省的比例為45%與55%。<sup>48</sup> 較於以往，更多資料出土的當前，賴香吟並不以多族群的白色恐怖受難史為主體，而是以臺灣這塊土地的多重殖民性為主體，大致延續了其作品以臺灣土地為主體的多重殖民性的歷史關切。

### 三、反英雄敘述：轉向普通人視角

塞托從菁英大敘述轉向庶民小敘述，關注匿名的無名群眾的反英雄敘述（anti hero）。臺灣威權反思中被強調、被鼓吹的行動往往是反抗，甚至反抗才能意識覺醒與否決被奴役，<sup>49</sup> 目前臺灣社會的白色恐怖論述也可看到反抗史觀和苦難敘事的雙重敘述。然而，賴香吟卻跳脫這樣的雙重敘述開展兩種層次思考：一是筆下人物不論是政治受害者、體制協力者或在場旁觀者的角色，一開始並沒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卻在日常實踐中被捲入政治體制的運作，因而在日常實踐中展開隱匿、逃離、日常抵抗等文本。從成為政士的清治、因政權遞嬗而生存碰壁的文惠到被監控的海外臺灣人凱西，三者皆非強烈政治意識，而是某程度渴求安分守己，卻在安身立命的過程中成為體制中人、被監控者、在場旁觀者。當政治受難者凱西與被捲入體制中的清治都有著同樣安身立命的意志，卻捲入相近又相異的情境，賴香吟同情地理解威權下的平凡者或成為受難者或成為體制協力者，其間的距離極為曖昧模糊、一線之隔、難以二分。兩者之間共同之處更是處於無奈、矛盾、困頓的狀態，跳脫加害／受害、威權／烈士、英雄／苦難黑白二分的簡化。二是賴香吟作品中直接反抗者經常落幕失序，直視威權的抗爭者也非凱旋歸來，映現

<sup>47</sup>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著，陳雅馨譯，《正義與差異政治》（臺北：商周，2017），頁87-128。

<sup>48</sup> 參考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之重要資訊專區，<https://www.ey.gov.tw/Page/FB349249FFDD1600/35a61a97-11d0-41ed-be73-38982466e688>（2023.04.01微引）。

<sup>49</sup>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著，嚴慧瑩譯，《反抗者》，頁5-42。

烈士殉難的身影。事實上，〈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凱西小姐〉遇上鎮壓噤聲的時代，見證風起雲湧的反抗運動。小說貼著1975年《臺灣政論》創立和蔣介石逝世、1977年中壢事件、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以及海外臺灣人運動的展開。吳乃德就提及中壢事件為1947年之後首次反抗者以身體對抗獨裁政權，「擴充了民主抗爭的行動劇碼」<sup>50</sup>，可視為雷震組黨之後的戰後第二波民主運動。原為歷史學者筆下的民主抗爭行動劇碼，卻在賴香吟的作品中淡成背景，而應當被歷史所記憶的主角也成為旁觀人物，如文惠女士幫傭家庭中從事反抗運動的蕭醫師、清治的同學張光明、凱西從事海外運動的阿辰等人，賴香吟轉移視線讓英雄敘述成為次要和聲，甚至落幕成為配角。具體來看，〈清治先生〉描述美麗島事件後風聲鶴唳，國民黨政權在媒體對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士貼上「偏激份子顯露猙獰面目」、「假美麗島之名幹醜惡勾當的暴徒」等標籤，所有的民主運動參與者皆被逮捕。<sup>51</sup>緊接著，林宅血案、軍事法庭公開審理，後陳文成因曾經捐款《美麗島雜誌》而受到情治單位注意，1981年7月3日陳屍臺大校園。1983年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推薦立委選舉候選人。<sup>52</sup>〈清治先生〉中張光明於學生時期便常於美新處閱讀書刊，也是小說中對政治局勢有明確批判的人物，張光明參與美麗島事件被判刑，出獄後難以就業、酗酒、住進龍發堂，成為政治精神病患。<sup>53</sup>美麗島事件被捕的參與者，或面臨睡眠剝奪、尊嚴摧毀、刑求作為懲罰和取得自白、出獄後面臨監控等。有意識的抗爭者張光明在政治壓迫下，無人理解其語言與理念，精神疾病既是政治創傷、亦是壓迫下尋找出口而逃逸於政治威權肆虐。

同樣地，〈凱西小姐〉中的凱西在海外運動見識到示威、抗爭、遊行及自由的風起雲湧，經歷世界學潮的年代（如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刺蔣事件）。然而，當同儕投入到組織時，凱西小姐則是相對安分守己，面對熱衷政治的阿辰，凱西還會勸他不要那麼關心政治，反而希望阿辰專注讀書以求發展。但阿辰大衣藏長刀，刺傷身為監控者的政治

<sup>50</sup>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臺北：春山，2020），頁31-64。

<sup>51</sup>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頁93-142。

<sup>52</sup>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臺北：五南，2015），頁297-304。

<sup>53</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白色畫像》，頁106。

人物，對他來說，「嘴講無效，思想無效，只有靠行動才會使證明」<sup>54</sup>。上述反抗/苦難者並沒有成為主要敘述，而以凱西、清治的視角敘述其無奈處境。賴香吟關注非烈士、非英雄般的異質敘述，對比反抗者與殞落者凸顯凱西與清治並非勇於對抗而是渴望安身立命的反英雄敘述。

另一方面，賴香吟反英雄式的論述也呈現在對於反對運動分歧書寫上。本文認為此有幾層意義。首先，將抵抗者對抗威權的大敘述去神化、去英雄化，凸顯其異質分歧、利益衝突、人性糾葛的一面。其次，上述書寫策略一方面將英雄人物普通人化，放下道德制高的單一敘述。另一方面，書寫視角因此從反對運動的檯面人物轉向無名小卒。〈凱西小姐〉海外同鄉會從黑名單時期到分裂歧異：「以前作伙袂冤家，這馬煞因為錢和位，喊變面就變面。」<sup>55</sup> 並且，美麗島事件的受刑人日後也政治分歧，這使得凱西「已經不完全理解臺灣當下政治，以前講統獨，後來轉成藍綠，然後又分深淺，還有什麼綠皮藍骨、藍皮綠骨，搞得她腦袋得轉好幾轉，現在又來一個綠頭藍身？」<sup>56</sup> 戒嚴半輩子，好不容易等到總統直選，卻是爭論吵鬧的局面，海外臺灣人的處境，無法落葉歸根，而是「予風吹得四界亂亂飛」<sup>57</sup> 的處境，透過凱西批判反對運動大敘述。

值得注意的是，賴香吟〈暮色將至〉、〈文青之死〉、〈喧嘩與醜陋〉、〈蟬聲〉也呼應內部反省的視角。例如，〈暮色將至〉書寫在黨國威權下參與民主運動的阿君，淡出政治及罹癌住院的人事變化，呈現對民主運動的批判、政治局勢的轉變，還有權位與利益的重新洗牌，正如阿君前夫說的「以前努力爭取來的如今濫用糟蹋至此」、「衝突非但沒有化解，且是更草莽地對立」<sup>58</sup>。〈暮色將至〉直搗反對權威的民主運動過程，當局勢重新洗牌，過往的理念卻被政治利益所占據，不得意者呈現一籌莫展的狀態。如出一轍地，〈文青之死〉寫著青春時期經歷過民主化運動初期的中年人們，出口便是自由、民主一大堆漂亮口號，但「到了三十幾歲，遇到切身利益，

<sup>54</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19。

<sup>55</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199。

<sup>56</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08-209。

<sup>57</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46。

<sup>58</sup> 賴香吟，〈暮色將至〉，《文青之死》（新北：印刻，2016），頁42-43。

就會把每個人真正的酸鹼度測出來了」<sup>59</sup>。而〈喧嘩與醜陋〉則是書寫在野行動者之間的分歧，敘述者說著：

時代剛解嚴，什麼樣的議題都可以絞在一起，相互為用，彼此覺得志同道合。那時候，大家手上沒權力，也沒位置，不會有太多機會透露出每個人價值與理念上的真正取向，要等到後來，各自生活出現一張利害關係圖，遇到事情，才清楚看到對方的判斷和選擇原來不同於自己。<sup>60</sup>

最後，〈蟬聲〉宛如總結般地描述「這段時期好像沒有什麼英雄了，英雄在上一回合的波浪洗得差不多了」<sup>61</sup>。劉淑貞提及，賴香吟書寫學生運動與反對運動時，拒絕運動的「集體性」化約，因為運動內部是充滿喧嘩的異音，運動的邊界也是需要被挑戰的，<sup>62</sup> 劉亮雅也指出賴香吟對於反對運動有所反省，拒絕神話化反對運動或學生運動。<sup>63</sup>

由此來看，〈凱西小姐〉再次回應上述作品篇章所呈現的非英雄般的反抗者、內心的掙扎困頓，以及海外運動者的分裂與不堪。當前，有關臺灣民主運動的討論，經常將英雄敘述與臺灣苦難敘述並行，而〈凱西小姐〉一文嘗試更為貼近海外黑名單「想探問日常、真實的人、亂七八糟的情緒、早到或遲到的領悟；無論怎樣的時代，總不可能鐵板一塊，亦不可能人人一樣」，賴香吟的諸篇作品不乏對於民主運動變質的批判，讓運動者成為有利益糾葛、愛恨情仇的普通人。或許，就像黃懿慧提及九〇年代「學運世代」的賴香吟，總是反思運動者回歸現實後的姿態，懷疑以往所追求的知識與信仰、批判所追求的「主體性」，對理想時代的逝去和悼念需要透過反覆反省才能確定自身的位置。<sup>64</sup> 但是，本文認為賴香吟是從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的分裂、內爆共同體的美好假想，以及對於集體認同的批判。馬丁

<sup>59</sup> 賴香吟，〈文青之死〉，《文青之死》（新北：印刻，2016），頁239。

<sup>60</sup> 賴香吟，〈喧嘩與醜陋〉，《島》（臺北：聯合文學，2000），頁86-87。

<sup>61</sup> 賴香吟，〈蟬聲〉，《史前生活》（新北：印刻，2007），頁148。

<sup>62</sup> 劉淑貞，〈風景的罪愆——論賴香吟小說中的抒情主體及其演化〉，頁139-179。

<sup>63</sup>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與底層人民〉，頁7-43。

<sup>64</sup> 黃懿慧，〈學運世代知識分子的知識實踐：賴香吟小說研究〉，頁59-67。

(Biddy Martin) 和莫漢蒂 (Chandra T. Mohanty) 就曾指出運動群體中結盟 (coalition) 和家 (home) 之間的差異。「家」作為社群共同體追求同質性、歸屬感、整體性，此社群共同體藉由將異質排除在外以穩固邊界認同。然而，追求同質、整體、歸屬、排除異質共同體具有盲點，需反思群體內部的異質、差異、權力不均的結盟尋求差異合作。<sup>65</sup> 由此，賴香吟對反對運動、學生運動的批判，實則是對共同體和集體認同的批判，等於更貼近現實地寫出利益糾葛、愛恨情仇、甚至有時難堪的反英雄敘述。

#### 四、歧異／歧義的隱匿文本

誠如前文提及，塞托和斯科特十分關注日常生活中非直接抵抗的反抗行為，許多日常實踐都是屬於戰術行動，也就是萬毓澤所詮釋的「微觀政治實踐」，抵抗是可以在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中實踐的。<sup>66</sup> 同樣地，陳淑卿所謂的詮釋戰術是蜿蜒迂迴地進入他人的地方，從日常生活實踐來挑戰權力關係，重新詮釋邊緣主體與邊緣空間。<sup>67</sup> 由於日常反抗是非正式的、通常是隱蔽的，<sup>68</sup> 過往經常將抵抗位置放在有意識反抗的政治行動，但在這裡本文希望重思主體與威權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弱者武器和隱匿文本究竟在《白色畫像》中如何呈現？以下，將分為體制中人與隱匿文本、日常叛離與逃逸，以及不受國家統治的藝術這三部分進行討論。

##### (一) 體制吸納與隱匿文本

賴香吟的白色恐怖作品一再展現抗爭／服從、受害／加害、苦難／英雄的非二元簡化，正如何林尼可斯 (Alex Callinicos) 所強調的理解歷史不僅

<sup>65</sup> Biddy Martin &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Feminist Politics: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 in Teresa de Lauretis Ed.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91-212. 陳昭如，〈性別平等運動的結盟政治〉，《婦女新知通訊》317期 (2015)，頁33-36。

<sup>66</sup> 萬毓澤，〈從日常戰術到新革命主體：論de Certeau、Holloway與Negri筆下的權力與抵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期 (2007)，頁57-131。

<sup>67</sup> 陳淑卿，〈家在邊緣：《摯愛》的空間政治〉，《英美文學評論》6期 (2003)，頁111-152。

<sup>68</sup>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頁1-3。

要揭露社會結構，更必須理解人。<sup>69</sup> 任何行動必須透過意向來解釋，也就是行動者因信念與慾望而產生行動，因此人不是客觀結構的「承載者」<sup>70</sup>；換句話說，「社會結構本身既是人類行動的結果，又是人類行動的條件」<sup>71</sup>。如此一來，必須追問的是〈清治先生〉中清治的意向為何？身為政士的他，是屬於加害者、沉默的串謀者嗎？

目前有關深化大寫國家體制與小寫日常生活的複雜關係的作品，都提供了我們從複雜體制理解行動的視角。例如，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就提及威權體制藉由消除受害者的個人性，或是移除個人在道德上的心理負擔、運用從眾服從的壓力、避免脫離群眾等方式來捲動普通人參與到威權體制之中。此外，在二戰屠殺的過程讓行為者沒有預警和思考的時間，甚至讓屠殺行為本身成為一種救贖論述（即讓受害者不再受苦）。<sup>72</sup> 這本探討納粹德國清洗歐洲猶太人的後備警察營著作，深刻書寫了加害體制如何透過微小行動而共同完成，以及一般普通人如何成為體制中人。進一步來看，李維（Primo Levi）曾經書寫在猶太人內部位階、集中營資源匱乏及其淘汰篩選的機制底下，為了生存，無不費盡心機，使得作為人的資格被取消的雙重意義——「加害者」的無動於衷與惡的日常，以及受害者成為一具空殼。<sup>73</sup> 此外，李維拒絕將政治暴力簡化為受害者與迫害者兩個陣營，尤其當特權囚犯在集中營人口生態中是少數，卻占了倖存者的絕大多數時，能在集中營存活下來的人，更多是身處於「灰色地帶」，必須運用手段、費盡心思存活下來。<sup>74</sup> 面對這樣的灰色地帶、倖存難題，〈清治先生〉中的清治並非對惡無動於衷，而是倖存者為求生存而處於灰色地帶。

<sup>69</sup>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新北：群學，2007），頁12。

<sup>70</sup>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頁47。

<sup>71</sup>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著，《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頁16。

<sup>72</sup> 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著，陳雅馨譯，《普通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臺北：春山，2022）。

<sup>73</sup>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吳若楠譯，《如果這是一個人》（臺北：啟明，2018）。

<sup>74</sup>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倪安宇譯，《滅頂與生還》（臺北：時報，2020），頁27-102。

楊翠提出「各種灰色地帶，揭露我們對於集中營記憶的刻版化、簡單化、公式化」，灰色地帶也可以避免將善與惡簡化，畢竟惡也有可能作用在任何人身上。<sup>75</sup> 在此，我們必須理解體制與人是如何產生行動的。具體來看，在二戰戰火出生的清治，面對戰後社會的貧困，一心期待從師範學校畢業後，能夠賺錢養家分擔家計，學習在窮困中認命。<sup>76</sup> 但1960年雷震被捕，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也遭逮捕。<sup>77</sup> 1965年，清治在清泉崗服役，學習三民主義、政治常識及領袖訓示，在黨國軍隊中面對思想作戰此一無形戰爭，在這樣的氛圍下，清治受到鼓勵報考陸軍總司令部的政士考試，必須熟記發揚民族仁愛、獻身殉國精神。但是，由蔣經國主導的政工系統進行軍方政治工作，擁有並施行於統御體系的組織，其各級政治部門主任與政工主管除了參與政治教育、防諜、宣慰活動之外，亦有權過問官兵經歷、人事等事務。<sup>78</sup> 當時，清治為了安身立命在苦讀國家各項綱領，考進政士體系的國軍政士，成為「效忠領袖的清治」<sup>79</sup>，不過清治於前臺的「公開文本」因不對等的權力而須服膺國家所需，以依附體制取得生存機會。然而，在寄給妻子的後臺「隱匿文本」的信中透露心聲，「生在這個時代裡的，都是不幸的一群」。<sup>80</sup> 後來的「隱匿文本」並沒有與國家政策吻合，背負養家責任的清治加入政戰工作，並非出於對國家的認同而是來自於生活穩定的需求。

花亦芬在討論體制吸納協力者時，就指出東德共產黨吸收線民經常出現威脅利誘和哄騙欺瞞，像是運用二戰期間失去父母、缺乏家庭支持的青年，或是威嚇恐懼性傾向被發現而屈從於秘密警察指揮的同性戀者。當然亦有為了邀功或順利獲得出國機會而盲目擔任線民者。<sup>81</sup> 夏克勤討論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於羅馬尼亞共產時期監控檔案時，也提出體制協力者必須鑲嵌在複雜的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中來理解。有人積極參與體制；有

<sup>75</sup> 楊翠，〈導讀：灰色地帶的光與塵〉，收錄於《滅頂與生還》，頁5-11。

<sup>76</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9-34。

<sup>77</sup>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185-205。

<sup>78</sup> 若林正丈著，賴香吟譯，〈蔣經國與李登輝〉（臺北：遠流，1998），頁85。

<sup>79</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55。

<sup>80</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37。

<sup>81</sup>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2016），頁344。

人則是蒙混過關。<sup>82</sup> 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 對於體制中人的討論，認為不完全取決於個人勇敢或懦弱的決定，而必須鑲嵌在社會網絡與人際連結中。<sup>83</sup> 目前，臺灣社會對於線民的研究，林國明也指出的「目前從檔案來看，以金錢為誘因是吸收線民最直接可見的方法，因此也特別容易鎖定原本家境清寒者為對象吸收」，此外也會以或明或暗的威脅手段來迫使對方接受。<sup>84</sup> 這就可以回應到小說中清治受限於生活條件，而投入到體制工作之中。同樣地，雜貨店少女春鶴為了經濟考量，考進國防部女青年工作訓練班，在部落服務教授注音符號與國語。雖然，春鶴並未認同國家政權，但在生活求職的過程中，也捲入時代體制參與國語教育和國防工作。尤其，春鶴在金門參與救護支援之際，必須放在1958年八二三炮戰的第二次臺海危機的時空背景上，此時上位者進行意識形態的銘刻，而春鶴在戰爭情境所產生的愛國心是時代下的產物。由此，從清治與春鶴的人生歷程可以看出自顧不暇的生活令他們選擇進入體制求生存。

弱者的戰術與隱匿文本顯然也是後臺的非正式行為。體制中人清治的蒙混過關與隱匿文本，將從幾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1958年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立法院通過出版法，此時《自由中國》社論主張政府撤回修正案，接著不久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炮戰發生。<sup>85</sup> 而清治、張光明從美國新聞處取得資訊、閱讀《自由中國》，當時就讀師範學校的清治在圖書館閱讀《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也藉機「看了平常總拿不到的《自由中國》」<sup>86</sup>。此處，清治的日常閱讀戰術也充滿矛盾性；一為體制吸納之文宣，一為批判體制之雜誌。現實中，與小說人物同一世代的戴振耀（1948-2017）在「進入高雄岡山高中後，他發現圖書館竟然有全套的《自由中國》雜誌」<sup>87</sup>，熱

<sup>82</sup> 夏克勤，〈秘密警察的秘密與人類學者的自我田野之旅〉，收錄於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梁永安譯，《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秘密警察監控檔案》（新北：衛城，2022），頁9-19。

<sup>83</sup> 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梁永安譯，《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秘密警察監控檔案》，頁426。

<sup>84</sup> 林國明主持，汪宏倫、葉欣怡協同主持，〈「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成果報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https://www.ey.gov.tw/tjb/86D698942CB061BA?page=2&PS=15&>（2023.02.12徵引）。

<sup>85</sup>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155-160。

<sup>86</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26。

<sup>87</sup>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頁98。

衷閱讀《自由中國》並展開知識上的汲取，可見戰後初期閱讀《自由中國》對於當時青年具有知識出口的重要性。此外，在單打雙不打的時代，張光明和朋友偷聽對岸的〈告臺灣同胞書〉來了解政治局勢，在日常行為上，清治與張光明閱讀、收聽廣播便違反國家政策，這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戰略、卻也有逃逸國家治理軌道的後臺。

其次，1976年清治在中學任教，學校賀主任經常對其他教員具有政治戒備防患未然，清治則不以為然，只能好言相勸或做做樣子處罰學生。在「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時代，清治在校園也擔保其他同事非匪諜的責任。黃應貴在思索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時，便引用蒂利（Charles Tilly）與斯科特的概念，指出抵抗可能透過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以消極的方式反映對於當前社會的不滿，此種消極會被視為與反抗精神背道而馳，但消極抵抗隱含著對於公共的不同意，成為一種掩飾的藝術與遮蔽的文本。<sup>88</sup>

尤其，當領袖之子蔣經國到校視察，學校的「公開文本」必須訂做「蔣公銅像」、標語重新噴漆、確認禮堂國父遺像，這些細節動作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前臺進行的政權配合。當蔣介石銅像送來時，清治細細打量：

把這尊新來的銅像，細細打量一遍。照理講，每尊銅像都是相同的，不會也不能有任何閃失，但不知為何，他老覺得眼前這尊像有些不同。是微笑的神情嗎？還是姿勢、角度不同？說起來，他是親眼看過領袖的，不過，那時領袖戴軍帽，不同於眼前光頭，不，哪能說光頭，不要命了？那該怎麼講？額頭？天庭？他琢磨著，詞窮，感嘆自己離那全心全意擁抱知識的少年已千里遠，再說，當時領袖雖然親在眼前，但哪有膽量多看一眼呢？<sup>89</sup>

清治直視銅像，將威權領袖視為光頭可說是大逆不道之語，此外當領袖之子「不學他的父親展示威嚴，卻要表現去農村、去漁村、去工廠，握農民的手、孩子的手、老兵的手、罪犯的手，為什麼？」<sup>90</sup> 清治不免質疑著「握

<sup>88</sup> 黃應貴，〈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黃應貴主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新北：群學，2021），頁1-46。

<sup>89</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73。

<sup>90</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79。

握手又怎麼樣？千萬別傻，中計就死定了」<sup>91</sup>，但「要怎麼判斷一個人？不，那樣的人是他可判斷的嗎？」<sup>92</sup> 由此不難看出清治心中的戒慎恐懼。特別是對於領袖之子，清治並無崇拜感，但也毫無挑戰懷疑。事實上，賴香吟曾經翻譯若林正丈於1997年完稿的《蔣經國與李登輝》，當中便提及蔣經國以政治警察與政工人員來控制軍方組織，除了掌握特務機構和政工系統，也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培養自己的權力班底，甚至掌控對外的情報工作，針對政敵或體制外的反對陣營進行情報蒐集、監視、逮捕及拘禁工作。由此看來，蔣經國掌握的機構不僅是統治集團之間的權力整編，也是白色恐怖肅清、檢舉的主要機關。<sup>93</sup> 七〇年代，蔣經國在政權正統上因外交危機而受到打擊，不得不將政權轉而植入臺灣社會以尋求認同，為抹除特務頭子的負面印象，也盡力塑造親民的形象。<sup>94</sup> 而在農村、漁村握手親民的蔣經國，在〈清治先生〉筆鋒一轉下，便是美麗島與林宅血案的篇章。如同賴香吟在受訪時提及，威權統治不一定是透過暴力，而是透過親民愛物來施展在人民身上，使身在其中的人感到迷惑。<sup>95</sup>

在1982年的篇章，是以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為時代脈絡，清治看見校園新進教師對於教條守則照單全收，且在校園舉發與考核同事們的思想。清治面對校內年輕同事：

新來青年掛在最上的那些教條守則，他何嘗不知，何嘗不曾背得滾瓜爛熟，但他背這些是想日常生活安頓，沒想動用這些來擾亂日常生活，可現在，這個比他當初大不了幾歲的青年，照單行事，小聰明全用在自保，逐條逐句舉發誰有嫌疑、誰該思想考核。他既不能反駁他，又不能同意他，拐彎抹角提是他自己愛國就好，不要傷及無辜，偏偏這些年輕子弟笨牛般不解其意，還惱羞成怒。<sup>96</sup>

<sup>91</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79。

<sup>92</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82。

<sup>93</sup> 若林正丈，《蔣經國與李登輝》，頁1-83。

<sup>94</sup> 若林正丈，《蔣經國與李登輝》，頁144。

<sup>95</sup>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頁166。

<sup>96</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95。

清治熟記教條守則是為了生活安頓，也因忙著生活而毫無非分之想，對於擾亂日常生活的政治監控，清治並不認同。相較於國家美化的小市民生活，清治所經驗的小市民生活是監控和考核的日常。此外，本文比較《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與《白色畫像》的兩個版本，發現最初版本的清治被迫閱讀〈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但在修改成書後的《白色畫像》則是刪除〈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篇名，<sup>97</sup> 通過這兩版本的互相參照即可看出賴香吟的政治批判。清治在過去十年來開會、座談、上課聽過也用過多遍，為免於恐懼而支持執政黨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雖然捲入政黨政治體制的打造，但內心卻又暗暗指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與實際領教過的小市民生活有所差異。賴香吟在受訪中提及，不知不覺中就讓體制成立，且雨露均霑而感謝體制。<sup>98</sup> 然而，清治卻不時出現隱隱然不服從的隱匿文本。

美麗島那幾年風雨欲來，清治看著那些敢於燒掉警車的火把沒有熄滅，選舉越來越熱，清治必須照舊監票開票，但看那些被抓去關的、臺上講話的，都是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人，清治不但壓力很大且心情複雜。<sup>99</sup> 尤其林宅血案後，清治出現難以承受的煩躁，也為過往背誦過的十二項綱領感到荒謬。張亦絢認為清治是「有黨職，無黨魂」<sup>100</sup>，清治不僅無黨魂，更隱藏著不認同的隱匿文本。那麼清治是「沉默的申謀者」嗎？必須留意的是，沉默通常為填補談話間的停頓與縫隙，沉默可能是積極迴避、假裝不知情、共同否認、共同迴避、讓人忽略某事，打破沉默者可能受到懲處，然而，將隱密的事情推到大庭廣眾之下才算是打破沉默。<sup>101</sup> 本文認為清治受限於時代，但並非被社會結構所決定，歷史也非「沒有主體的過程」，<sup>102</sup> 必須透

<sup>97</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103；賴香吟，〈白色畫像——清治先生〉，《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2期（2020），頁94。

<sup>98</sup>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頁169。

<sup>99</sup> 賴香吟，〈清治先生〉，頁108。

<sup>100</sup> 張亦絢，〈後者將至：讀賴香吟的「年代五書」兼論其新作〈清治先生〉〉，《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2期（2020），頁110-124。

<sup>101</sup> 伊唯塔·傑魯巴維（Eviatar Zerubavel）著，黃佳瑜譯，《沉默申謀者：日常生活中的緘默與縱容》（臺北：早安財經，2008），頁28-195。

<sup>102</sup>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頁12。

過意向、信念與慾望而產生行動，也就是人不是客觀結構的「承載者」<sup>103</sup>。「行動涉及轉化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事件走向的能力——的行使」<sup>104</sup>，萬毓澤也指出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gency）並非對立兩難，而是需要認知與理解行動者的行動意向，什麼信念與慾望使行動者以某種方式行動，以及必須意識到時間因素與社會結構的關係。<sup>105</sup> 清治不只是結構的承載者或沒有主體的人，而是在其中不停出現隱匿文本與現實擺盪，如閱讀《自由中國》、焦躁無奈、視蔣銅像為光頭、質疑蔣經國的親民愛物、認為背誦綱領荒謬，皆是後臺的弱者戰略與隱匿文本。

另一方面，賴香吟書寫〈清治先生〉實則呼應《其後それから》中所言，關注出生在戰火中的父執輩：

靠著發霉的地瓜籤與別無出處的決心，從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早早揹起養家餬口的責任——父親們的人生完全是以現實為基調的，政治且使他們規訓，被壓抑，被蔑視，被管制只能習以為常，忍受被人誤解為次等人的悲哀，忍受整個族群恨鐵不成鋼的屈辱，這些父親們的歷史我們不曾知曉，因為他們如此謹言慎行。<sup>106</sup>

而賴香吟所書寫的父執輩，那些平凡、普通、倖存者，也映照出清治先生的同輩人，父執輩在艱難的時代「一直那樣執著勇敢地要活」，賴香吟書寫普通人的日常是為了「盡可能貼身感觸清治先生活過的時代，藉之去瞭解你的父親及其同代人，是怎麼樣的思考、生活、為難，以至於他不願意跟你再提起任何事情」。<sup>107</sup> 那些父執輩的平凡、日常、普通，其複雜的後臺意向、隱匿文本為賴香吟所關切的內涵。

<sup>103</sup>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頁47。

<sup>104</sup>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頁211。

<sup>105</sup> 萬毓澤，〈譯者導言〉，《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新北：群學，2007），頁55-88。

<sup>106</sup> 賴香吟，《其後それから》，頁210。

<sup>107</sup>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頁163。

## （二）日常叛離與逃逸

赫緒曼在討論人與威權的關係時，提出了叛離、抗議和忠誠三種不同態度，本文認為叛離亦可能是弱者的實踐與隱匿文本。具體來看，〈文惠女士〉中的文惠並非無所作為，或只是非歷史主體的旁觀者。通過文惠的日常實踐得以察覺政治如何滲透平凡日常，也看見日常瑣碎如何成為叛離方式。戰後，文惠家中需要其協助分擔家計；因為時局紛亂工作難尋，家裡解決難題最為簡易的方式就是將文惠嫁出。文惠喜愛張美瑤的電影，如此日常的娛樂，卻發現戰後以來臺語電影越來越少。在丈夫過世後，文惠必須想方設法謀生，然而「日本時代讀的書，現在丁點用處也沒有，想來想去，不如做以前的差事。臺北，這種講國語的地方，要早幾年，還輪不到文惠女士，但現在願意幫傭的年輕女孩、外省媽媽似乎少了，文惠女士雖然忐忑，還是帶著一口破國語，出門求職去了」。<sup>108</sup> 很明顯地，文惠在日本時代的知識養成，因為改朝換代毫無用處，但戰後的語言政治，卻也造成文惠即使從事幫傭工作也較無籌碼，甚而在官員教授比例高的昭和町當幫傭時，幫傭家庭的老母親講家鄉話，文惠不懂，餐桌的菜色也不合胃口，因此被辭退。從語言到餐食，從這些極為細小的地方卻看見政治差異對於文惠生活改變甚大，只能輾轉在工廠煮食與擔任寄宿女傭，最後在同樣經歷過日本時代的蕭醫師家中工作才安頓下來。

期間，文惠幫傭家庭的蕭醫師參與黨外運動，文惠不理解為何蕭醫師要參與其中。乍看下文惠彷彿是毫無政治意識的時代旁觀者，然而文惠並沒有積極學習「國語」以求謀生，而是選擇離開語言政策的網羅，雖然此種離開也是被迫，但文惠是以離開來拒絕為安身立命而積極參與國語政策。此外，當文惠因為擔任幫傭被呼喚為歐巴桑時，心中總會浮起自己的日文名字ふみえ以對抗模糊不清的稱呼，此便具有女性主體與歷經日治主體的雙重意義。這樣保有日治以來的日常生活細節亦與主體認同息息相關；文惠身為女性、受日本教育，日文名字是女性主體命名也是臺灣人殖民的刻痕，也是弱者的實踐中以消極逃逸的方式保有自我。

〈文惠女士〉描述文惠一生操持家事勞動，而賴香吟在〈天竺鼠〉、〈文青之死〉同樣寫過女性與家務瑣碎的關係。〈天竺鼠〉書寫父權文化

<sup>108</sup> 賴香吟，〈文惠女士〉，頁129。

下的女性家務日常是反覆瑣碎的枷鎖；尤其對女性而言，日常生活絕非簡單的對手，身為妻子面對的日常生活經常是「種種繁瑣、俗膩、反覆、頑固，以及那些時不時冒出之溫善、恆常的勸誘，以至於讓人不得不投降而默默容忍並允許了它日復一日的過程裡，徹底領教了現實堅強的道理」<sup>109</sup>，並且「日常生活，有它天羅地網、牽一髮動全身、一旦失序便搞得雞飛狗跳的組成」<sup>110</sup>。無論喜不喜歡，日常生活注定是無法踢開的現實，包含每個人出生、入學、兵役、結婚、離婚、死亡，一生在戶籍裡不過化成制式幾個字，卻是每天充滿疑難雜症。<sup>111</sup>〈天竺鼠〉中的女性日常是父權文化與婚姻體制對於女性的枷鎖。同樣地，〈文青之死〉描寫充滿理想的文青在邁入婚姻之後，被捲入現實生活框架的困境，像是吉兒婚後「進入育兒袋鼠生活，更不容易參與什麼」<sup>112</sup>，婚後女性被生活愈拉愈沉，「洗衣，洗碗，拖地，如海綿點點滴滴吸飽了日常的濕度，我好希望有誰來擰乾我身上的濕氣」。<sup>113</sup>

相較之下，〈天竺鼠〉和〈文青之死〉的女性日常是一則父權隱喻，女性在日常瑣碎中生活支離破碎。同樣是女性家務勞動的日常，〈文惠女士〉的女性繁瑣日常則是一則國族隱喻。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1986年發表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提出了第三世界文本都是國族寓言的觀點。<sup>114</sup>也就是說，在被殖民、被威權壓迫的情境下產生的文本，都折射出國族隱喻與國家政治的線索和情境。很明顯地，文惠的家務勞動雖然牽涉到當時臺籍女性幫傭的日常，但此種日常卻無處不涵蓋臺灣政權轉移後族群關係、語言政策的相關時空背景，女性的家務日常不只是面對父權的產物，也牽涉到國族的隱喻。而〈文惠女士〉的日常實踐，以破國語操持日常來拒絕國家威權的整合。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將人的活動分為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三個層次。勞動是生活與生計，目的在於保障了個人的存活。工作是「人造」世界中進行生產。然而，只有行動才能展現個體的多元性，並致力於開創政治，以達到真正的公

<sup>109</sup>賴香吟，〈天竺鼠〉，頁90。

<sup>110</sup>賴香吟，〈天竺鼠〉，頁91。

<sup>111</sup>賴香吟，〈天竺鼠〉，頁91。

<sup>112</sup>賴香吟，〈文青之死〉，頁231。

<sup>113</sup>賴香吟，〈文青之死〉，頁232。

<sup>114</sup>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1986), p. 69.

共性、展開「行動的生活」。<sup>115</sup> 以漢娜·鄂蘭的論點來看，文惠停留在勞動與工作的日常，而未進入行動，但本文認為，文惠的日常瑣碎其實是前述許甄倚提及的日常生活的卑微人物、尋常事物與日常重複性所具有的安身立命價值，甚至更進一步對抗政權轉移，以及多重殖民下的分離、分裂和解體。<sup>116</sup> 因此，文惠透過日常瑣事的家務勞動，來維繫、保有自身從日治以來的習慣，藉此不被新政權吸納與生活網羅。

### （三）不受國家統治的藝術

薩依德（Edward Said）曾提及，流亡是游牧的、非中心、具震撼性力量。<sup>117</sup> 而海外黑名單即是一部臺灣流亡史。凡是在海外參與臺灣同鄉會、臺獨聯盟等組織，便可能成為政府的黑名單，面臨特務監控活動現場、批評黨國的藏書消失、海關沒收書籍等，更有職業學生在海外監控臺灣留學生。<sup>118</sup> 1989年鄭南榕自焚，陳婉真闖關回臺出現在喪禮上；同年11月，黑名單郭倍宏偷渡返臺，出現在中和市綜合運動場立法委員盧修一、省議員周慧瑛的聯合政見會，大談臺獨主張。<sup>119</sup> 黑名單保留的史料包含了政治監控、海外運動、闖關回臺等，但賴香吟〈凱西小姐〉勾勒的卻是另一層次的海外臺灣人圖像。

具體來說，凱西一開始並非因政治意識展開政治行動，相較於其他海外臺灣人的抗議精神，其更渴望安分守己平凡度日。然而，政治將凱西捲入風暴中，使她被盯上而面臨特務監控「從侯先生到阿辰，那些討厭的眼睛跟著自己，骯髒地寫著她的名字，那些討厭的抓耙子，老鼠似的尖嘴巴，阿辰不是把牠們給砍了？怎麼沒完沒了？」<sup>120</sup> 凱西的日常充斥著監控感，就像是「蚯蚓春泥出土似地，明明已經奮力砍牠一刀，卻複生成兩隻，再砍，

<sup>115</sup>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林宏濤譯，《人的條件》（臺北：商周，2021）。

<sup>116</sup> 許甄倚，〈平凡中的非凡：吳爾芙的日常生活書寫與瑣碎政治〉，頁97-129。

<sup>117</sup>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2016），頁21。

<sup>118</sup> 許建榮，〈國府統治時期對海外留學生的監控：以美國為例〉，張炎憲、陳美蓉主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歷史學會出版，2010），頁323-362。

<sup>119</sup>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364。

<sup>120</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15。

又成四隻，然後八隻，十六隻，三十二隻，成了百，成了千，爬過來，圍過來……」<sup>121</sup>，而凱西也經常在同樣的噩夢中驚醒：

那些面無表情，默默掏出相機來的人，在現實裡也確實沒有減少，甚至多了幾位。凱西小姐既恐懼，又恨自己恐懼，怎麼能夠恐懼？恐懼不就稱了那些人的心？然而，只消在哪兒看見了東方臉孔，凱西小姐胸口收緊，愈走愈覺得身後黑影尾隨，成群蚯蚓鑽出腦袋，往下爬過她的食道，她的肝，她的膽，然後滑進她的肚腹……。<sup>122</sup>

在海外，深刻感受到政府監控的力量，此外當中華民國失去了聯合國席位後人心惶惶，「臺灣同鄉之間更需要彼此取暖，然而，同鄉會依舊不被允許，政府愈是恐懼，愈是杯弓蛇影，凱西小姐覺得身邊一直都在的管控，是愈盯愈緊了」<sup>123</sup>。此種監控並沒有伴隨解嚴畫上句點，儘管解嚴多年，總統直選，凱西回臺灣依然驚惶，「她知道沒什麼好怕，但有些事情就像衣服弄髒了，怎麼洗也洗不回原來的乾淨，每次回臺灣，她依然感覺身後有眼睛盯著，上次總統大選，還和康和搭同班飛機，才不至於自己亂驚惶」<sup>124</sup>，甚至凱西回臺灣重情重義去拜訪朋友，卻讓朋友被地方管區拜訪而留下陰影。<sup>125</sup>海外多年返臺卻依然有戒嚴時期的陰影，「每次回臺灣，她依然感覺身後有眼睛盯著」<sup>126</sup>，相較於年輕一代留學生討論國家定位時內心已無恐懼，這讓凱西好生羨慕。〈凱西小姐〉呼應歷史，根據調查局於1981年編印的《佈建工作手冊》所佈建的線民資料顯示，有40%平均分布於各行政村里，另60%則平均分布於社會結構各層面。<sup>127</sup>

然而，在日常監控下，凱西依然渴望回歸家鄉，「自己的國家社會可以和別人的一樣自由開放，如果可以，凱西小姐何嘗不想生活在自己的土地，

<sup>121</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15。

<sup>122</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16。

<sup>123</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190。

<sup>124</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52。

<sup>125</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25。

<sup>126</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52。

<sup>127</sup> 林國明主持，汪宏倫、葉欣怡協同主持，《「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成果報告》。

做一個所謂有用的人」<sup>128</sup>，並且，渴望回鄉的原因在於「和領袖同齡的母親也是老了，兩個政府、兩種文化，各活半輩子，耳不聰，目不明，說想念女兒，但電話聽不見，照片看不清楚，就盼著她回去，臉對著臉，手撫著手，貼在耳畔說些體己話」<sup>129</sup>。縱使如此，凱西仍不敢回臺灣，怕回去就出不來。

怕回不去與出不來的凱西，其臺灣意識卻是在海外萌芽，在西柏林工作的凱西，「時不時想起臺灣，比在巴黎的時候更常想起，不是想家，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悶，一種暫時的安全，無法思考未來，總說要改變、會解決，但誰知道什麼時候？也許永遠沒辦法，也許明天就改變」。<sup>130</sup> 漂泊海外多年的凱西，成為流離的臺北人，將他鄉作故鄉，其流亡狀態正如薩依德所言再度爆發震撼的力量，成為自身的立足點與臺灣意識的土壤。

斯科特描述拒絕國家威權控制者逃離至沒有國家權力結構的地方，可能也是一種抵禦和對抗的方法。未受統治的「非文明人」在政治選擇上跟國家保持距離，地理空間因而出現受國家控制區域的國家空間，以及抵抗國家控制的無國家空間。<sup>131</sup> 或如前述提及的與威權的三種態度，其中的叛離是逃離事情令人厭惡的狀態，<sup>132</sup> 便是拒絕被國家治理。凱西的叛離是被迫流亡、返鄉不得、家庭分離，然而，此種流亡也展現海外臺灣人被迫／拒絕被治理的不受統治的態度。

## 五、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和〈凱西小姐〉中的日常生活、弱者戰術、隱匿文本與普通人書寫。這三篇都以經歷過日治殖民的臺灣人經驗來書寫日常與時代之間的碰撞，呈現經歷日治殖民的臺灣人如何陷入政治忠誠度的嫌疑犯、語言的鄉土味與日本氣、被排除在公職領域的一體

<sup>128</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189。

<sup>129</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24。

<sup>130</sup> 賴香吟，〈凱西小姐〉，頁221。

<sup>131</sup>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李宗義譯，《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臺北：五南，2018）。

<sup>132</sup>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李宗義、許雅淑譯，《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頁39-186。

三面。此外，目前臺灣白色恐怖論述可以看到反抗史觀和苦難敘事的雙重敘述，但在賴香吟作品的反抗者不是英雄敘述與苦難光環，而是沉寂落幕失序的故事，且從英雄／苦難雙重敘述轉向普通人視角。當加害／受害邊界曖昧不明、無法簡易二分，賴香吟卻以同情地理解寫出清治、文惠及凱西皆是渴望安身立命、安分守己之人，並非有強烈政治意識，而是在日常實踐中擺盪於順服／反抗、逃離／回歸、前臺／後臺、公開文本／隱匿文本之間，以及普通人被吸納、被排除在體制的居間狀態。如王毓莉詮釋斯科特指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間，並非順從或反叛二擇一，而是在不順從與抵抗之間，有複雜的意向動機與生活實踐。<sup>133</sup>

透過塞托提出的戰術行動與微觀政治實踐，斯科特討論的反抗的日常形式、弱者的實踐、隱蔽的文本、不被統治的藝術，以及赫緒曼指出的叛離、抗議和忠誠等概念，<sup>134</sup> 討論〈清治先生〉、〈文惠女士〉和〈凱西小姐〉的體制中人與隱匿文本、日常叛離與逃逸、不受國家統治的藝術，便可發現〈清治先生〉不只是結構的承載者或沒有主體的人，而是在其中不停出現前臺忠誠、後臺隱匿文本的戰術，像是閱讀《自由中國》、對政權焦躁無奈、視蔣介石銅像為光頭、質疑蔣經國親民愛物、對背誦綱領感到荒謬，在在皆是一種弱者戰略與隱匿文本。同樣地，〈文惠女士〉的臺籍女性幫傭繁瑣日常，則是一則國族隱喻，女性家務勞動不只是父權的產物，也牽涉到國族的隱喻，以瑣碎拒絕政策網羅與主體分裂。文惠女士的日常實踐以破國語操持日常拒絕國家威權的整合，並以日常重複性來安身立命，甚至免於國家威權下的分裂與解體。最後，〈凱西小姐〉的叛離是一種被迫的流亡；然而，此種流亡展現海外臺灣人被迫流亡，但也是拒絕被治理的態度。

<sup>133</sup> 王毓莉，〈馴服vs抗拒：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新聞學研究》110期（2012），頁43-83。

<sup>134</sup>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頁1-3。

## 引用書目

- 王毓莉，〈夾縫中求生存：中國大陸社群媒體治理下的抗拒策略〉，《傳播研究與實踐》10卷2期(2020)，頁85-114。
- ，〈馴服 vs 抗拒：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新聞學研究》110期(2012)，頁43-83。
- 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之重要資訊專區，<https://www.ey.gov.tw/Page/FB349249FFDD1600/35a61a97-11d0-41ed-be73-38982466e688> (2023.04.01 徵引)。
- 伊唯維塔·傑魯巴維(Eviatar Zerubavel)著，黃佳瑜譯，《沉默串謀者：日常生活中的緘默與縱容》(臺北：早安財經，2008)。
- 朱宥勳，〈賴香吟《凱西小姐》人物影射筆記〉，《朱宥勳 | 小說·評論·臺灣文學》，<https://chuckchu.com.tw/article/331> (2023.04.02 徵引)。
-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著，陳雅馨譯，《正義與差異政治》(臺北：商周，2017)。
-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新北：群學，2007)。
-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蔡宜剛譯，《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上下)(臺北：麥田，2002)。
- 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著，陳雅馨譯，《普通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臺北：春山，2022)。
-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臺北：春山，2020)。
- 林國明主持，汪宏倫、葉欣怡協同主持，《「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成果報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託研究，<https://www.ey.gov.tw/tjb/86D698942CB061BA?page=2&PS=15&> (2023.02.12 徵引)。
-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2016)。
-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著，嚴慧瑩譯，《反抗者》(臺北：大塊，2014)。
-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李宗義、許雅淑譯，《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臺北：商周，2018)。
- 若林正丈著，賴香吟譯，《蔣經國與李登輝》(臺北：遠流，1998)。
- 范銘如，〈當代小說的南部書寫〉，邱貴芬、柳書琴主編，《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 3期：臺灣號》(臺北：文建會，2007)，頁379-398。
- ，〈路人的政治，隔的文學〉，《印刻文學生活誌》167期(2017)，頁76-79。
- 夏克勤，〈秘密警察的秘密與人類學者的自我田野之旅〉，收錄於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梁永安譯，《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秘密警察監控檔案》(新北：衛城，2022)，頁9-19。
- 高夫曼(Erving Goffman)，徐江敏、李姚軍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臺北：桂

- 冠，1992)。
- 張亦絢，〈後者將至——讀賴香吟的「年代五書」兼論其新作〈清治先生〉〉，《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2期(2020)，頁110-124。
- 梁世韜，〈流行歌曲與記憶的重唱疊影——論賴香吟〈文青之死〉及《白色畫像》的文本互涉與歷史重構〉，《雲漢學刊》47期(2024)，頁202-246。
- 莊瑞琳、夏君佩、賴香吟編，〈一個半徑很大的零：賴香吟×莊瑞琳柏林臺北連線〉，《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2期(2020)，頁130-179。
- 許建榮，〈國府統治時期對海外留學生的監控：以美國為例〉，收錄於張炎憲、陳美蓉主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政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歷史學會出版，2010)，頁323-362。
- 許甄倚，〈平凡中的非凡：吳爾芙的日常生活書寫與瑣碎政治〉，《英美文學評論》20期(2012)，頁97-129。
- 陳昭如，〈性別平等運動的結盟政治〉，《婦女新知通訊》317期(2015)，頁33-36。
- 陳淑卿，〈家在邊緣：《摯愛》的空間政治〉，《英美文學評論》6期(2003)，頁111-152。
-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吳若楠譯，《如果這是一個人》(臺北：啟明，2018)。
- ，倪安宇譯，《滅頂與生還》(臺北：時報，2020)。
- 黃錦樹，〈散步到他方〉，《霧中風景》(臺北：印刻，2007)，頁195-202。
- ，〈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論嘗試文》(臺北：麥田，2016)，頁325。
- 黃應貴，〈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黃應貴主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新北：群學，2021)，頁1-46。
- 黃懿慧，《學運世代知識分子的知識實踐：賴香吟小說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楊翠，〈導讀：灰色地帶的光與塵〉，《滅頂與生還》(臺北：時報，2020)，頁5-11。
- 萬毓澤，〈從日常戰術到新革命主體：論de Certeau、Holloway與Negri筆下的權力與抵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20期(2007)，頁57-131。
- ，〈譯者導言〉，《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新北：群學，2007)，頁55-88。
-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南京：譯林，2007)。
- ，李宗義譯，《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臺北：五南，2018)。
- ，王審言譯，《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臺北：麥田，2021)。
- 廖紹凱，〈置疑的寫作者：論賴香吟《翻譯者》的「自反寫作」與失語困境〉，《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第29期(2023)，頁79-106。

- 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梁永安譯，《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秘密警察監控檔案》(新北：衛城，2022)。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林宏濤譯，《人的條件》(臺北：商周出版，2021)。
- 劉亮雅，〈跨族群翻譯與歷史書寫：以李昂〈彩妝血祭〉與賴香吟〈翻譯者〉為例〉，《中外文學》34卷11期(2006)，頁133-155。
- ，〈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期(2009)，頁7-36。
- ，〈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中外文學》39卷4期(2010)，頁7-43。
- 劉淑貞，〈風景的罪愆——論賴香吟小說中的抒情主體及其演化〉，《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3期(2021)，頁139-179。
-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2016)。
- 蔡雨辰，〈文學如何與當代生活共生——專訪作家賴香吟〉，《迷誠品》，<https://meet.eslite.com/tw/tc/article/201803070031> (2024. 06.19徵引)。
- 鄭淑怡，〈從零餘者、倖存者，回歸於生手的天真：論賴香吟《其後それから》的加法書寫〉，《子衿論衡》第6期(2021)，頁53-80。
- 鄭清文，〈評審意見：虛構與真實〉，《虛構一九八七：第二屆臺灣文學講作品集》(高雄：春暉，1999)，頁75-76。
- 賴香吟，《島》(臺北：聯合文學，2000)。
- ，《史前生活》(新北：印刻，2007)。
- ，《其後それから》(新北：印刻，2012)。
- ，《文青之死》(新北：印刻，2016)。
- ，《翻譯者》(新北：印刻，2017)。
- ，《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臺灣小說風景》(新北：印刻，2019)。
- ，〈白色畫像——清治先生〉，《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2期(2020)，頁5-107。
- ，《白色畫像》(新北：印刻，2022)。
-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臺北：五南，2015)。
-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Jameson, Fredric,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Autumn, 1986), p. 69.
- Martin, Bidy &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Feminist Politics: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 in Teresa de Lauretis Ed.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91-212.

